

国史十二讲

宋史十二讲

陈智超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陈智超 著

宋史十二讲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K244.09

C650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史十二讲/陈智超著.--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2
(国史十二讲)

ISBN 978-7-302-21731-2

I. ①宋… II. ①陈… III. ①中国—古代史—宋代—通俗读物 IV. ①K244.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43804 号

责任编辑:马庆洲

责任校对:王凤芝

责任印制:孟凡玉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http://www.tup.com.cn>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52×228 印 张:24.5 字 数:319 千字

版 次:2010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000

定 价:36.00 元

本书如存在文字不清、漏印、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部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10)62770177 转 3103 产品编号:036132-01

我的宋史研究

——代序

《宋史十二讲》将要和读者见面了。本书收录了我自上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有关宋史(含金史)的论著十二篇。我愿借此机会,向读者简介我的宋史研究过程。

我的父亲乐素先生是我国现代宋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又是我的研究生导师。我之所以选择宋史作为自己的一个研究重点,受到父亲的深刻影响。但是,父亲从来没有刻意要培养我成为一个宋史研究者,这是潜移默化的结果,也有一些偶然的因素。

我在《父与子》一文(收入《陈智超自选集》,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3 年出版)中曾经总结父亲对子女的影响:开明、启发与责任。从曾祖父开始,对待子女的开明形成传统。曾祖父维启公是个药材商人,曾经着力培养祖父读书、应举。但是,当祖父陈垣先生不愿受科举八股文的束缚,博览群书,遭到许多长辈斥责为不务正业时,他却力排众议,支持、放任他读喜欢读的书,终于成为一代史学宗师。祖父有十一名子女,他对子女职业的选择,从不干涉,从事史学研究的只有父亲一人。而且,父亲最初攻读的是经济学,是在三十岁以后才转向历史学的研究与教学的。到了我这一代,兄弟姐妹五人,如果包括堂兄弟姐妹共二十四人,从事史学研究的也只有我一人,而我,也是拐了一个大弯才转到史学上来的。

我高中毕业于 1950 年。当时正是建国之初,百废待举。我没有报考大学(如果当时报考,我也会选择国家建设急需的地质等学科,

而不会报考历史学系),先是报名参加土地改革,后来又到老、中缅边界参加公路修建工作。父亲没有干涉我的人生选择。在云南的几年,我一直工作在最基层,在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中,在百里无人烟的原始森林中,披荆斩棘,伐山开路,生活异常艰苦,险情不断,但充满建设者的豪情。这是我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日子。

1957年,中国建设处在“马鞍形”的底部,当年我们的工程局没有接到任务,全体工作人员在滇池边的呈贡县可乐村集训。只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领导才勉强同意我报考大学,我面临人生的又一次重大选择:报考什么专业?在云南边疆的五年,我一直从事技术工作,并坚持专业自学,报考工科应该是很很有把握的,但父亲多年来的潜移默化起了作用,我最终选择了历史学专业,并以第一志愿被北京大学历史系录取。在这之前,我报考什么大学,什么专业,并没有告诉父母。当我到北大报到、回家见双亲时,明显感觉到情感一向不外露的父亲的喜悦之情。我知道,他是为我们家庭有了第三代从事史学、并且是第一个史专业的学生而感到欣慰。

父亲在史学(特别是宋史)方面对我的潜移默化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这就是我在前面提到的父亲对子女影响的第二点:启发。祖父常用孔子“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话教育子女,父亲很好地实践了这一点。

1941年,当我还只有七岁时,父亲开始了《宋史艺文志考证》的写作。他有时带我到图书馆帮他抄资料。这件事给当时同在图书馆看书的容肇祖先生留下深刻印象,半个多世纪以后还对我谈起这段往事。在家中,他发动我们姊弟检查《四库提要》,发现其中提到“宋史艺文志”或“宋志”的地方,用红铅笔标出。标完之后,交换复查,凡查出对方有遗漏者,可得一小奖品。本来是枯燥的检查工作,变成了姊弟之间快乐的竞赛。1946年,我十二岁,父亲任教的浙江大学从贵州复员,我就读的浙大附中也迁回杭州,学校提前放暑假。我利用暑假为父亲誊录了《宋史艺文志考证》的第一稿。回到杭州以后,随

着年岁的增长,父亲交给我的“任务”也逐步加重。他在1947年发表的《主客户对称与北宋户部的户口统计》一文,有关北宋前七朝的户口统计数字和客户百分比,都是先由我反复计算,由他复核的。再往后,我也偶然会旁听他和母亲关于写作论文的讨论。虽然当时我对宋代历史的了解还是肤浅的,但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工作的甘苦,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父亲开始历史研究,重点是中日关系史。“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北,给了他极大刺激,从此转攻宋史。他的第一篇宋史论文《宋徽宗谋复燕云的失败》,就是痛感于国民党当局对日本侵略奉行“不抵抗主义”,连昏君宋徽宗都不如,借古喻今。三十年后的1961年,当我准备写毕业论文的时候,中国大地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独立、统一的中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但是香港、澳门仍然没有回归祖国,西方列强对新中国处处实行封锁,作为一个中国古代史专业的应届毕业生,我选择了《嘉靖中浙江福建地区反对葡萄牙殖民者的斗争》作为我毕业论文的题目。我认为揭示这一段历史的真相,颂扬中国人民反抗殖民主义侵略的光荣传统,是我这名青年学子的责任。

1962年,我们将结束五年的大学学习。当时没有大学毕业生自谋职业一说,同学们都在等待毕业分配。大家都没有把握:毕业后分配到什么岗位,是从事研究还是教学;是在大学还是中学;还是在其他单位。正在这个时候,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领导派了一位学术秘书来找我。他说,乐素先生虽然从1956年起就兼任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但因为人民教育出版社主持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工作,非常繁忙,以致他的宋史专长未能充分发挥。他们建议我报考父亲的宋史专业研究生,如果考取,将来可以协助他进行研究,更好地发挥他的作用。并说此事已征得父亲的同意。我答应了。

通过考试以后,我成为宋史专业研究生,这是我研究宋代历史的开始。原定的题目是“王安石和他的时代”。在研究生阶段,我通读

了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北宋的一些重要文集，认真钻研了唯物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封建社会的论断。正要开始写论文的时候，主持历史所工作的尹达同志要我结束学业，到学术秘书室工作。不久，“文化革命”爆发，一切研究工作陷于停顿。

1971年，我们在河南信阳市五七干校。我和十几位同事先后调回北京参加郭沫若院长主持的《中国史稿》的编写工作。我是《史稿》第5册（五代宋辽金元部分）四名执笔者之一。1983年6月，《史稿》第5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编写《中国史稿》的原定目标，是为中层干部提供一部中国历史读物。参加《史稿》第5册的编写工作，第一，使我对宋代历史有了一个全局的了解。从纵的方面来说，是宋代与先行的五代十国与后续的元代的继承发展关系；从横的方面来说，是宋朝与同时并立的辽、西夏、金及周边政权的关系。第二，是对有关宋史的基本史料有了一个基本的掌握。第三，对前人的宋史研究成果，包括日本学者的成果，有了进一步的接触。所有这些，为我后来的宋史研究，打下了稳固的基础。但因《史稿》第5册的每一章节都经过集体讨论修改，所以没有把我执笔的章节收入这部《宋史十二讲》中。

20世纪70年代，中越关系逐步恶化，这种情况也反映到史学领域，特别是中越关系史的研究领域中。为了让广大人民了解中越关系史的真相，我和同事们出版了《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并作了全书的统一编辑工作。在此基础上，我写了《一二五八年前后宋蒙陈三朝间的关系》的长文，揭示了宋理宗朝宋、蒙和越南陈朝三方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我在文章的结尾说：“将历史真相告诉人民，这是历史学家的神圣职责；也只有符合历史实际的史学著作，才能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20世纪80年代初，普林斯顿大学的刘子健教授将一位美国学者介绍给我。她要将南宋人袁采的《袁氏世范》翻译成英文，并据此写一部书，请我加以指导。这不仅需要我对她不了解的字句从字面上

加以解释,还要进一步分析它的内涵。为此,我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在此基础上,我写了《〈袁氏世范〉所见南宋民庶地主》一文。

1986年,由于种种机缘,我看到了过去的金石书从来没有著录过的几通有关金元真大道教的重要石刻。而在此以前,我与曾庆瑛为了校补祖父援庵先生的大型道教碑刻资料集《道家金石略》,做了大量工作。我结合有关真大道教的新旧资料,写成《金元真大道教史补》一文。

如果说,上面三篇论文的写作有一定偶然性的话,我的宋史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是历史文献学,具体来说,就是对宋代重要历史文献的研究。我在《自选集》的自序中曾经说过:“新史料的发现,史料真伪的判断及时代的确定,史料意义的多角度、多层次的诠释,以及发现和纠正文献在转录或刊刻过程中发生的无意及有意之误:这些是历史文献学的主要内容。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求真,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历史文献学是历史科学的基础。”

1981年,历史所的同事们集体编写了《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北京出版社1983年出版),这本书曾多次重印,并在2006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了增订本。我分工撰写了《宋代史料》一章,及合写了《辽金西夏史史料》一章。这是对宋代史料的全面的、一般的论述。在此前后,我对宋代的一些重要文献,包括《宋会要辑稿》、《名公书判清明集》、《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史》、《宋朝诸臣奏议》、《旧五代史》都作了重点的研究。

《宋会要辑稿》是现存宋代史料中最原始、最全面、最丰富、最翔实的一部。我们研究室曾计划校点、整理出版。但随着工作的进展及深入,才发现《辑稿》的来源及情况非常复杂,要整理出一部高质量的《宋会要》,先要理清《辑稿》形成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非较短期内能够完成。因为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课题,整理工作停顿下来了,我则继续对《辑稿》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并及时公布了阶段性研究

成果。“十年磨一剑”，到1995年我终于出版了《解开〈宋会要〉之谜》一书，在理清《宋会要》来龙去脉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整理《辑稿》的可操作方案。

《名公书判清明集》是南宋一部诉讼判词和官府公文分类汇编，过去流传的是已流落到日本的宋刻本残本四卷。我们在点校这个宋残本的过程中，发现了十四卷本的明刻本，整理点校了合宋、明两本的《名公书判清明集》。收入本书的《宋史研究的珍贵史料》一文，就是对《清明集》形成、流传过程及其丰富内涵的研究。我还运用《宋会要辑稿》和《清明集》的资料，写成《宋代的书铺与讼师》一文。

《旧五代史》是二十四史的一种，但原本已经失传，现在通行的是乾隆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及《册府元龟》等书中辑出的辑本。这个辑本问题很多，从1994年开始，我着手辑补这部宋初修的五代史。十五年过去了，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辑本的问题越多，辑补的难度越大。但我有信心在有生之年完成这项有历史意义的工作。

第二个方向是高科技在史学研究中的应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改变了人类活动的许多领域的面貌。作为人类最古老的学科之一的史学，是否能利用科学技术发展的成果？如何利用科学技术发展的成果？这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经常思考的问题之一。还在1986年初，我就发表了《建立宋史资料库的构想》一文，提出利用电脑建立宋史的史料库、信息库和经验库。1994年又发表《史学应用高科技的前景》，并提出通过DNA的比较来检验云南契丹后裔的血缘问题。1991年底到1994年，从提出建议到三次参加崖门水域宋元沉船的探测，则是我在这方面的一次具体实践。收入本书的《崖门水域宋元沉船的初步考察》，是在实践基础上的总结。

我的宋史研究的第三个方向是对宋代经济的研究。1989年，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两位总主编的田昌五先生及漆侠先生，约

请我作为该书第三册(宋辽金西夏部分)的两主编之一,并主持宋代经济部分的写作。我执笔写了其中的四章,论及宋代的人口、农业生产、地租、阶级结构,这四章开始写于1989年,几经修改,历时八年,至1997年全书出版。现将我执笔的四章收入本书中。

以上就是我的宋史研究的过程。为了充分地反映这个过程,本书“十二讲”大致按照写作时间先后编次。

即便是按照现在的标准,我也已经进入中老年。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生老病死是每一个人不可避免的规律,我不能预计辑补《旧五代史》的工作完以后,是否还能从事研究?是否还有机会继续从事宋史研究?我希望到时能继续从事宋史研究。如果是这样,本书将是我研究宋史的新起点。否则,这部《宋史十二讲》很可能就是我的宋史研究的总结。

学术研究犹如接力赛跑。就宋史研究来说,现在是我交棒的时候了。如果我的成就和失误、经验与教训,能对后来者起铺路石的作用,我的愿望就达到了。

最后,但非最不重要,我要对张国刚教授表示衷心谢意,是他策划了中国历史“十二讲”的系列,并推介我作为《宋史十二讲》的作者,使本书得以出版。我也要感谢清华大学出版社和本书责任编辑,感谢他们对本书出版提供的帮助。

二〇〇九年八月于北京

目 录

我的宋史研究——代序	III
第一讲 一二五八年前后宋蒙陈三朝间的关系	1
第二讲 《袁氏世范》所见南宋民庶地主	40
第三讲 宋史研究的珍贵史料 ——明刻本《名公书判清明集》介绍	81
第四讲 (上)《宋会要辑稿》的前世现世和来世	110
(下)《宋会要》食货类的复原	126
第五讲 金元真大道教史补	151
附：许昌天宝宫访碑记	174
第六讲 宋代的书铺与讼师	178
第七讲 崖门水域宋元沉船的初步考察	190
第八讲 宋代人口的增长与人口分布的变化	205
第九讲 宋代土地的开发与农业生产的发展	235
第十讲 宋代地主的剥削形态及其经营方式	262
第十一讲 宋代阶级结构	288
第十二讲 论重新整理《旧五代史》辑本的必要与可能 ——《旧五代史》辑本及其点校本	312
附录 宋史史料	335

第一讲

一二五八年前后宋蒙陈三朝间的关系

公元 1234 年(蒙古窝阔台汗六年、宋理宗端平元年)蒙古与南宋联合灭金以后,形成了蒙、宋之间直接冲突的局面。长江、淮河一线是双方的正面战场。从上游至下游,蜀、荆、淮是宋人所说的“三边”。当时蒙古采取攻势,南宋王朝取守势。

在此之前,1226 年初,越南北方的李朝为陈朝所替代。陈朝继续与宋朝保持藩属与宗主的关系,向宋朝称臣纳贡,接受宋朝的封号。越南史籍《大越史记全书》就曾记载,陈朝建立的第五年(太宗建中五年,宋理宗绍定二年),陈太宗“遣使聘于宋,宋封帝为安南国王”(《陈纪》一)。

1252 年(蒙古蒙哥汗二年),蒙哥汗命他的弟弟忽必烈平定云南。忽必烈在次年年底攻陷大理国都,留大将兀良合台继续平定云南各地,自己北还。到 1255 年,兀良合台平定了云南全境,开始与越南陈朝接触。

从蒙古平定云南开始,就形成了宋、蒙、陈三朝间错综复杂的三角关系。三方中的任何两方在处理相互间的关系时,都不能不考虑第三方的存在。因此,我们研究这一段历史,也应该从三方关系的总体上来把握、分析。

关于这一关系的研究,在我国史学界还是一片空白。山本达郎主编的《越中关系史》(日本山川出版社 1975 年 12 月出版,722 页)是近年日本出版的最详细的中越关系史专著,但它是将宋越关系、蒙越

关系分开来叙述的。至于越南方面的某些人,为了反华的目的,更是肆意歪曲这一段历史。

本文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填补这一空白,阐明历史真相。

一、李曾伯的《可斋杂稿》

有关这一问题的史料,中国方面如《宋史》、《元史》,越南方面如黎崱(元时在中国定居的越南人)的《安南志略》,吴士连的《大越史记全书》等,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但仅仅根据这些史料,只能勾画出这一关系的大致轮廓,还不能进行细致的分析和深入的研究。

这里要向大家介绍的是过去尚少为人利用的李曾伯的《可斋杂稿》,它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最详尽、最基本的材料。

李曾伯从宝祐五年(1257年)正月到景定元年(1260年)七月间,先后担任南宋荆湖南路安抚大使和广南制置大使,是南宋新开辟的西南战线的统帅。他的文集总名为《可斋杂稿》,包括《杂稿》三十四卷,收集了他在淳祐十二年以前的作品;《续稿前》八卷,收集了淳祐十二年至宝祐二年四月间的作品;《续稿后》十二卷,收集了宝祐二年四月以后的作品。

《可斋续稿后》卷五至卷九这五卷,全是李曾伯在上述湖南安抚大使和广南制置大使任内向宋理宗上的奏申,共有一百四十二份,整整十万字。除此之外,卷四还有他在这段时间上的辞免奏、乞休致奏、谢宣赐奏等二十二份,卷十二有杂著十二篇,还有混入《续稿前》卷五的记铭五篇,共约一万七千字。

史料价值最高的是卷五至卷九这一百四十二份奏申。它是作为直接当事人的李曾伯当时向宋朝最高统治者的报告,具有原始资料的价值。它的内容相当丰富,包括:第一,通过各种途径收集、了解的情况。其中又可分“敌情”(蒙古军队和使者在云南、越南北部活动的情况)、“交情”(陈朝内部的情况)、“边情”(南宋广西边境少数民族

的动向)。第二,宋理宗给李曾伯历次旨谕的内容。第三,南宋在广西地区防御蒙古、联络陈朝的各种措施,如军队的调遣,后勤的供应,城防的修筑,民兵的训练,对边境少数民族的争取,与陈朝使节的往来等等。第四,蒙古军两次入广西的详细战况。

当然,这些奏章作为研究这一问题的材料也有它的弱点。

从内容来说,由于作者只是宋、蒙、陈三方中一方的一个方面的统帅,对宋的全局掌握不够,对蒙、陈两朝情况的掌握也不可能很具体、很准确;同时,作为一个直接当事人,为了自身的利益,在章奏中难免有过分强调困难、夸大敌情、夸大战绩等情况。为了尽量减少这些因素给我们的研究带来的影响,本文在利用这些材料的时候,力求根据每一条材料的来源恰当地估计其可靠性,并用其他材料加以对照分析。

从版本来说,据我所知,《可斋杂稿》现存的只有《四库全书》本,收入《四库珍本丛书》中。《可斋杂稿》的这个版本同收入《四库全书》的其他书一样,在编修抄写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第一,是四库馆臣在当时清政府的高压政策下,窜改了许多容易引起嫌忌的字眼。《四库》本《可斋杂稿》凡提到蒙古的时候都称“敌”,初读时我就怀疑有窜改,但没有直接的证据。后来发现《续稿后》卷十二的《桂阌文武宾校战守题名记》曾经刻石,也收入谢启昆编的《粤西金石略》卷十三(题为《开庆纪功磨崖》)。两相对勘,《续稿后》两处“敌”字,《金石略》都作空白。“敌”字何必作空白呢?因此更增加了我的怀疑。好在这块石刻现在还保存良好,桂林市文管会将全文收入他们编辑的《桂林石刻》上册第三一一页(题为《抗元记事碑》)。一加对照,才知道《四库》本中的“敌”字,原文或为“鞑”,或为“虏”,或为“贼”,还有一处将“兽夷犯顺”改为“远人启衅”。再证以宋人著作《蒙鞑备录》、《黑鞑事略》,可知《四库》本《可斋杂稿》凡称蒙古为“敌”的地方,都不是原文。但是,我们仍不能一一确切指明,何处原文为“鞑”,何处为“虏”,何处为“贼”,所以在引用时一律不回改。第二,除了有意窜改之外,抄

写中因粗率而漏、衍、误、倒的地方甚多，有时甚至整行脱漏（参见拙作《李曾伯与静江城的修筑》，《文物》1979年第9期）。本文在引用《杂稿》中遇到此种情况，除了有直接证据并且是关键性的字句，略加考证并且改正外，一般不予改正或在改正处打一问号，以示存疑。

在写作本文的准备过程中，我曾经花了一些功夫，制作了三个表供自己使用。后来觉得它对了解本文所论述的问题和进一步利用李曾伯这些重要材料，或许还有些用处，所以把它收入文后作为附录。

第一个附表是《李曾伯奏申》。上述一百四十二份奏申都没有标明上奏日期，我根据原文或前后文，考出了大部分章奏的日期（或大致日期），发现文集虽然基本上是按上奏前后次序排列的，但也有少数将次序弄颠倒了。同时，章奏中相当一部分的题目都是《回宣谕奏》或《回奏宣谕》，使用时据目求文会有许多困难。我在表中将这些章奏编了号码，文中引用时就只注明它的编号，如“李湖1号奏”等。

第二个附表是《宋理宗谕旨》。李曾伯章奏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对宋理宗在此期间给他的“圣旨宣谕”的回奏。在一百四十二份章奏中，明确提到的理宗谕旨共有九十六道，虽然没有引全文，但都概括了谕旨的主要内容，而且大多数都有发出日期和收到日期。这些谕旨反映了南宋最高统治者对处理宋、蒙、陈三朝关系的指导思想及其前后变化，是研究这一问题的重要材料。为了引用方便，我也将它编号，如“理9号旨”等。

第三个附表是《大事记》。我以李曾伯的奏申为基本材料，参照其他史籍，编成这份宋、蒙、陈三朝关系的《大事记》。《大事记》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本文是分阶段按问题论述的，两者可以互相参照。

二、蒙古攻占大理后,宋朝建立西南战线的措施及陈朝的反应

蒙古攻占大理的目的之一,是以云南为基地,开辟对宋战争的新战场,从侧翼突破宋的防线,向南宋的心腹地带进攻。当时宋人把它称为蒙古的“斡腹之谋”。

蒙古军队从云南出发进攻南宋,有两条主要路线。北路经播州(贵州遵义)、思州(贵州务川),到沅州(湖南芷江)、靖州(湖南靖县);南路经邕州(广西南宁)、宜州(广西宜山)到柳州、静江(广西桂林)。两路的汇合点是潭州(湖南长沙)。由潭州北可以攻鄂州(湖北武昌),与正面战场形成夹击之势;东可以向南宋的腹心地带江西、两浙前进。反过来,从南宋这方面来看,为防御蒙古从云南进攻,潭州就成为一个战略枢纽,广西也由大后方一变而为前线。

从蒙古攻占大理之后,南宋政府就不断得到西南边境传来的警报。

《宋史全文》卷三十五载,宝祐三年(蒙古蒙哥汗五年,一二五五年)“二月壬午,上谕辅臣:广西之传如何?(谢)方叔奏:果有斡腹之谋,当亟修武备以防之”。这条记载虽然很简略,但从理宗与左相谢方叔的对答,可见当时广西方面已传来蒙古要进攻南宋腹心地区的消息。

《宋史》卷四四《理宗纪》载,宝祐四年五月“甲辰,罗氏鬼国遣报思、播言:大元兵屯大理国,取道西南,将大入边”。《宋史全文》卷三五关于此事的记载是:“(董)槐奏:蒲择之申:罗氏鬼国报思、播州,谓北兵留大理者,招养蛮人为向导。”罗氏,是当时一个少数民族的部落,受南宋政府的节制,在今四川南部、贵州西北部叙永、古蔺、毕节、金沙一带。所谓“罗氏鬼国”是南宋统治者对它的蔑称。

蒙哥汗七年,即南宋宝祐五年,“春,诏诸王出师征宋”(《元史》卷

三，《宪宗纪》）。因此南宋西南方面的情况也愈来愈紧张。据《宋史全文》卷三十五，二月“己巳，上曰：李遇龙奏：溪蛮为敌所有，欲为窥伺邕、宜之计”。九月“戊辰，上曰：蒲择之奏：鞑侵罗氏鬼国”。“甲戌，上曰：播州乞兵，想事势颇急”。所谓“溪蛮”，是当时统治者对边境内外少数民族的侮辱性称谓。从这几则记载可见，宝祐五年春以后，从现在的广西到贵州一线，南宋边防处处告急。

面对蒙古从西南方向的进攻，南宋政府也采取了相应的防御措施；特别是宝祐五年以后，在形势逼迫下，更加快了边防的措置。

宝祐五年正月初一（丁亥），宋理宗起用李曾伯为荆湖南路安抚大使兼知潭州，这实际上是建立了新的西南战线的司令部，任命了战线的统帅。当时所以把司令部设在潭州，是从防止蒙古从思、播和邕、宜两路进攻设想的。随着蒙古军队越来越着重南路的邕、宜，南宋政府也把防御的重点放在广西。同年十一月初五（丙辰），理宗命李曾伯兼节制广南，任责边防。十二月初二（壬午），又命他兼广南制置大使，移司静江，将司令部移往更靠近前线的静江府。

与此同时，南宋政府逐步往广西调遣军队。由于广西在宋朝长期处于大后方，驻屯广西全路的军队，从来没有超过两千人（李广 74 号奏）。闰四月中旬李曾伯到达潭州任所后，理宗就让他到湖南驻军中准备派三千人往广西戍守（理 1 号旨）。五月，又命他在潭州的飞虎军与武胜军中“整办六千人以备广西之戍”（理 2 号旨）。到十一月初，实际调往广西的戍兵大约是七千多人，除了湖南兵外，还有黄州、镇江、广东、沿江正副司等处的戍兵（李湖 7 号奏）。

除了调兵遣将外，一些重点城市也着手修筑。十月中，在广西经略安抚使印应飞主持下，开始修筑静江城（李广 2 号奏）。十一月初，李曾伯上奏理宗，请求修筑潭州城，“城当加之帮筑，池当浚之阔深”，并得到理宗的同意（李湖 6 号、13 号奏）。

由于越南北部同云南、广西接境，当时陈朝的动向对南宋西南战